

讲 述

戴爱莲:自然也是一种美

□梁宾宾



2004年的初夏,我走进了一个美丽、幽静的院落,鲜花摇曳,树影婆娑,就仿佛一组组美人盘旋在阳光下,鸟儿轻盈地游戏于花前树下,好像生怕惊扰了居住在这里的主人。我悄然走入这神话般的境界:四壁上悬挂有名人字画,大厅里摆放着线条优美、造型独特、花纹细致的钢琴,还有色泽虽已斑驳但质地依旧光润的地板。这里居住的是著名舞蹈艺术家、拉班舞谱的引进与推进者、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中国舞蹈协会名誉主席戴爱莲。

院落里的自然景致,看不出修饰过的痕迹,朴素而庄重的楼房比它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50年前,中国工人用建造人民大会堂剩余的材料,在这里盖起了这两座华侨公寓。坐落在花坛中央的篮球场,曾经是戴爱莲的学生们开Party的舞蹈场所;彩灯高照、舞曲飞扬、佳人起舞的热烈场面,想想都令人神往。就连戴爱莲居所的客厅也曾是她的学生们舞蹈排练场。已经故去的画家吴作人原是戴爱莲的老朋友和邻居;画家叶浅予原是戴爱莲的丈夫——在这歌舞升平、诗情画意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只有积极快乐,没有消极悲伤。

当时,戴爱莲已是88岁的高龄,但在她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不倦的神采和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们的交谈是随意而愉快的。我相信任何一个面对她都会循着她的心路历程进入一个神圣的舞蹈殿堂,那殿堂是优美的、灵动的,撼人心魄而不可朽。

戴爱莲的父母亲都是广东人。戴爱莲1916年5月出生在三代侨居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岛上棕榈成荫,椰林如盖,奇花异草开遍道路两旁,林中栖息着各类飞禽。幼时的戴爱莲最喜欢小巧的蜂鸟,它羽毛美丽,飞翔时双翅高频鼓动,像一只翩翩起舞的小精灵。

戴爱莲自幼对芭蕾舞和钢琴非常感兴趣。1928年,戴爱莲凭着优秀的天资考入了特立尼达芭蕾舞蹈学校,几年后随母亲定居伦敦。她曾在安东·道林·玛格利特·克拉斯和玛利·兰伯特等舞蹈名流的指导下学习古典芭蕾舞,后考入了莱斯里主办的舞蹈工作室研习现代舞。由于父亲生意破产,戴爱莲参加了在英国西南部德文郡——达亭顿庄园尤斯·雷德舞蹈学校所举办的夏季6周免费舞蹈训练班,在那里学习现代舞。由于对舞蹈的痴迷和热爱,年幼的戴爱莲渴望成为这所学校持有奖学金的正规生。经过努力,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了舞蹈理论家拉班的情感表现方法、舞蹈技术理论和拉班舞谱。

舞蹈这门艺术很早就吸引了戴爱莲,同时上帝也赋予了她丰厚的舞蹈天资。特立尼达岛有“复活节”前狂欢的习俗,这使幼小的戴爱莲与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节奏感很强,常担任儿童舞蹈的领舞,她五六岁时就开始演出歌舞剧,成为这个岛上第一个和白人学习芭蕾的华人。每逢演出,台下都有人新奇地叫喊道:“看啊,中国小女孩!”

后来,戴爱莲经常登台演出,通过电视屏幕和舞台,她已经成为当时英国家喻户晓的名人。然而戴爱莲是一位特别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她自生长在海外,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教育,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英国上学时她不会讲汉语,感到很可惜。在大英博物馆里,戴爱莲阅读到英文版的《中国历史》,这使她大开眼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她,尤其是盛唐文化使她着迷。

戴爱莲称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Rudolf Laban)为“外公”,因为她是拉班舞谱的第三代传人。在中国,她引进和普及了拉班舞谱,始终以此作为教学的基础。她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向我阐释了舞谱的重要性:“什么是乐谱?就是舞谱,如果音乐没有乐谱,贝多芬、肖邦的音乐就不可能被流传下来,舞谱的作用也是如此。”拉班舞谱在国

际舞蹈界很通行,每两年一次的国际拉班舞谱年会,都会在不同的国家召开。她热情地告诉我,她是第一个将拉班舞谱介绍到中国来的人,虽然中国从事拉班舞谱工作的人数不多,却具有国际水平。

戴爱莲很重视舞谱的原理和它的科学性。她认为,很多艺术形式都是由文字来记录的,比如人类用甲骨文和东巴文记录了历史,中国古代用官、商、角、徵、羽来完成音乐的流传。由于舞蹈没有文字记录,许多人说它没有文化而轻视它,使它处于艺术的边缘状态。而舞谱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的优势在于容易被理解被掌握。它的符号形象、具体而简单,它的作用就像文字一样,便于演员理解编导的意图。

几十年来,她已经运用拉班舞谱记录下了中国藏族舞蹈、秧歌、霸王鞭和其他许多民间舞蹈了。她去云南时看到纳西族用东巴文记录了古老的祭祀舞蹈,便由她的学生用拉班舞谱记录了其中两段舞蹈。当这“东巴舞谱”被带到国外展示时,前来参观的人当中已经有人读着拉班舞谱跳出了源于中国800年前少数民族的祭祀舞蹈了,这令在场的人非常激动。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内,同时陈列着戴爱莲的石雕头像和世界上另外三位女性舞蹈家的肖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舞蹈事业已经成为戴爱莲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她经历过许多坎坷,但从不抱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都没有终止过练习。在她的眼里,芭蕾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和残酷,而是一门快乐的艺术。幼年在英国时,由于她的个子小而不能进入芭蕾舞团。她说,她可以不进,只要允许她上芭蕾课,她就已经很高兴了。

为了请戴爱莲提供一些与我稿件相关的图片,那年的晚秋时节,我又一次敲响了她的家门。“来了,来了……”她总是以这热情、朴素的语言迎接客人的到来。当她了解了我的来意后,捧给了我足够的照片,我精心挑选出其中的3张,她热情地向我描述了这一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像个孩子似的抬头问我:“文章刊出后能送给我一份吗?”“当然,不止一份。”她摇摇头表示不用,她只是需要有一份作为收藏。

记得初次拜访戴爱莲时,中途我提出要去洗手间,她立刻站起身来领我进了那间面积不大却十分整洁的洗手间。回到客厅,她向我讲了这么一件往事:早年建的房子通常每户只有一个洗手间,一个人使用不会感觉有什么不方便。一次她的学生到她家来上舞蹈课,中途说有事要离开一会儿,戴爱莲放她去了。可是等了好久才见她回来,于是就问她去哪里了。她回答说,她要方便,出去找厕所,找了很久才找到。她觉得有必要在家里再建出一个洗手间来。于是就请工人师傅在家里挤出一块地方,造出了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所以现在房子里有两个洗手间……她操着不太地道的汉语,认真地向我描述着这桩她认为很重要的事。这时我也明白了,当我提出要去洗手间时她那种本能的反应。无意之中她所表现出的游离于现实以外的本真和细致入微的善良,使我忘却了她的年龄和身份,记住了她的可爱和亲近。

看天色已晚,我便起身告辞,这时她从房间里拿出一本书《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送给我。我郑重地接过,翻过封面请她题字,她说:“我的中文字写得不好,写英文可以吗?”但她还是用汉字一笔一画认真地写了“送给梁宾宾 戴爱莲 2004年11月14日”。当我离开华侨公寓时,已暮色茫茫,华灯初上,我走向霓虹闪烁的街道,走向热闹的人群。眼看着秋日的落叶在橘黄色的路灯下滑行,内心不免涌来几多悲凉。谁会想到在中国,戴爱莲没有一位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可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那幢闹中取静的楼房里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和温暖的气息。戴爱莲一直保持着直爽、活泼、纯真、执著的个性,以及她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前一次采访结束后我为她拍照,希望她笑一笑,因为我觉得她笑起来特别迷人。而她却说:“不一定要笑,自然也是一种美。”拍过之后,她把她的家庭服务员招呼过来对我说:“请为我们俩拍张合影吧。”

2006年2月9日,90岁的戴爱莲走完了她卓越的一生,临终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她留下遗嘱,将房子和银行存款全部捐献给国家。至此她留给自己的依旧是那个平和的心境,留给世界的是她的全部——舞蹈艺术,还有她的真诚。



記 錄

《老背少》劇照



《和平鸽》劇照

虎溪山庄不时便有“鸿儒”探访,不免大声谈笑;也常有本地的“白丁”与主人往来走动。

而它只接受王天墨,对其他人一概加以戒备,包括书法界的人士。

心有戒备,就慢慢地远离人群,最后它失踪了。

谈笑几日,王丹突然发觉那猫几天不肯抛头露面了,赶紧四处寻找。工作室、烧制间、卧室、酒吧、回廊……所有的角落都不见踪影。可是,夜里似乎还能听见猫叫。

最终,王丹望着悠远的山谷叹了一口气,心想——既然不想留下,便是缘分尽了,由它去吧。

王丹正怅然若失,却听见头顶传来两声怯懦的“喵!喵!”

王丹抬头一看,愁云散尽。它爬到那棵高大的山毛榉上去了。

可是,它死活不肯下来。这让王丹颇费了一番工夫。

王丹跟它解释,往来的都是艺术家,不会伤害它的。可是它非常顽固,就是不肯接受王丹的劝说。

王丹无奈地打量这只倔强的小猫。这几天它日夜蹲在树上不吃不喝,已经瘦得不成样子。所有的毛都呛起来,两眼无神,萎靡不振。它几乎虚脱了。

王丹赶紧扛来云梯,把它抱下来,好生将养。安顿几天后,它终于恢复过来,毛顺了,眼亮了,并且在它闪亮的目光里多了几分信赖。打那以后,它渐渐与其他来客坦然相处。偶遇雅集,还蹲在画案旁边歪着头欣赏玩味一番。朋友们戏称这猫是一只亲近艺术的猫。

当然有时候还是回到山毛榉上去玩耍一番。它毕竟还是一只很本色的猫。

王丹的呵护让它信赖所有人类,让它懂得书法家篆刻家们温良的情怀。

在虎溪窑小住半天,与王丹谈艺,看王丹写字、刻印。那只猫时而旁观,时而远观,时而心猿意马关注窗外的飞虫。

王丹淡定、从容、温和,对生活对艺术均有高拔的体认和坚守,我得以走近一个从事书法篆刻艺术的大家。他让我对整个书法篆刻艺术产生一种信赖:他们是值得敬畏的中国文化的传承者。

别临,我特意跟那只猫道别,因为我俩一定有某种共鸣。

不能言传,却可意会。

现 场

有一种静默叫伤痛

□杜文娟

小时候,听爸爸唱一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首歌,悠扬的曲调、美丽的色彩。最令我向往的是歌中的场景,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进了学校,背着橘红色的花书包,从蹦蹦跳跳到羞羞怯怯,才知道遥远的天边有一种地貌叫高原。高原上有雪山、草原、藏红花和洁白的羊群。

追随着这些文字,一次次来到高原。再后来,我到了青藏高原最西端一个叫阿里的高原,不但看到了高原的美景,还体会到了寒冷、孤独、雪崩和稀薄的空气,深深地理解了生的艰难、死的容易。

有一天,一个美妙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她叫刘兴秀,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曾两次援藏,历时5年。她在给我朗读她的《云天之冠》。这是她在援藏期间写出来的一本心灵感悟之书。她的声音是那样悦耳,情绪是那样饱满。她激情荡漾地朗读,我微笑着倾听。从太阳高挂在天空,到漆黑的夜晚降临,我们一直在一起,一直朗读与倾听。从她声情并茂的诵读中,我知道了一个个故事。

在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地方,一个小女孩等了她两天,为的是送给她一把嫩绿的豌豆角。在海拔5000米的札达山上,人家问她想吃什么,她随口说这里海拔高,羊肉一定很鲜美。两个小时以后,她果然吃到了香喷喷的手抓羊肉。从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下山途中,三辆车相撞,她险些丢命。撞车前两分钟,她刚刚把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取下来。如若不然,相机紧贴胸口,与车身剧烈撞击,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她幸免于难,但鼻子流血,好一阵才清醒过来。

朗读自己撞车经历的时候,她依然很流畅,好像这些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跟她没有一点关系。而她读到才旺拉和尼玛拉的时候,停顿了好几次。一再给我解释,才旺拉和尼玛拉在阿里地区某单位工作,一位是领导,一位是农牧业方面的技术人员。她2003年去札达县和普兰县旅行时,才旺拉给她提供了车辆,他们三人同行。才旺拉40多岁,普兰县人,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尼玛拉的老家在林芝,打算将来退休以后到拉萨生活。

她的再停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不管是才旺拉还是尼玛拉,都不是一个藏族男人的全名,而是对朋友的昵称,这里面一定有故事。忽然,我看到了她眼镜片后面晶莹的泪光。她合上书本,伤心地对我说:“才旺拉去世了,大概2006年左右。拉萨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当时我惊讶极了,我想给他家人打电话,表示我的慰问,但没有打通。”

她说,才旺拉的死因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才旺拉的一个朋友的家人去世了,要送到神山冈仁波齐的天葬台天葬。朋友来跟他借车,才旺拉怕朋友对车况不熟悉,就主动陪同这位朋友出车。车还没到天葬台,运送尸体的车就翻了,才旺拉和朋友都死了。这一天,天葬台一下天葬了他们3个人。

她停在那里,把书放在膝盖上,我们两人安静的坐着,一言不发。这种静默只属于最好的朋友,只有与西藏神灵相通的人,才感应和触摸到彼此的忧伤。

2009年7月29日下午,我在中国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和副政委张毓育交谈。一位军官敲门进来,拿着一张纸,请张毓育签字。我从纸的背面隐隐约约看见了两个字,挽联。但是我不确定,待他签完字。我说,张副政委,我能看看这张纸吗?她把纸递给我,确实是一幅草拟的挽联。

张毓育说,这位战士上山刚半年,是一位新兵,19岁,老家在内地农村。5天前,一辆地方上的长途货车在219国道上翻车,司机卡在驾驶室出不来,希望部队援救。我们就派了几名战士执行任务。这位战士爬到驾驶室,用电锯切割车体,车厢的货物掉下来砸伤了战士的头部。当时战士只是头痛,没有特别反应,过了几个小时,就死了。政委说:“这种事故几乎每年都发生,阿里高原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最忍受不住的是处理战友的后事。怕面对战友父母哭肿的脸庞。这位战士的父母接到电话,就从老家省会城市转乘飞机到拉萨,昨天已经从拉萨乘汽车往这边赶。再过两天他们就该到了,战士的遗体还在太平间躺着……”

张毓育沉默下来,我也沉默下来。很长时间,我们面对面,什么也没有说。

张科,是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的军医,也是“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之一。在八大警种部队数万名官兵中,能荣获此项殊荣的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张科说起黄帅之死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2002年4月,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奉命挺进阿里,养护和保通新藏公路叶城到萨嘎段。他们的专业术语叫上勤。从叶城到阿里海拔一路飙升,路上遭遇暴风雪。张科是随队军医,和战友们一样,也出现了头痛脑涨等高原反应,但只能忍着,不能让战友们看出来,以免动摇军心。还没有到狮泉河镇,驾驶员黄帅因为长途驾驶,体力严重透支,出现感冒症状,他没有将病情告诉军医。感冒很快引起肺水肿,给他输液吸氧,作用不大,又出现脑水肿。

他陪同黄帅乘上卫生车,快速赶到狮泉河镇,住进医院抢救,病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八支队领导将他的病情报告给武警总部,从兰州军区派来一架黑鹰直升机,要把黄帅和另外两名重病患者接到内地抢救。

飞机还没有飞越昆仑山,抵达神山下的狮泉河畔时,黄帅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张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而他,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却却没有能力挽救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让他每当想起就痛苦不堪。

黄帅才25岁,是一位新婚不久的新郎,妻子刚有身孕。黄帅牺牲以后,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安葬在新疆叶城烈士陵园。那里也是新藏公路零公里处。

每次下山到叶城,张科都要去祭奠众多的战友。他说,他有愧于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战友,但又毫无办法,这种苦只有医生才能理解。他经常下牧区,到农村,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分析病情,找出规律,希望在高原病研究上有所突破。

也是一位年轻战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见他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一边打,一边狠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老子前头!

战士们去拉拽父亲,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好不容易把父亲抢救过来,父亲的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那血珠黏稠得如同寒冬的蜂蜜,浓酽得化也不开。40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发全部变成了白头发。

张科一字一句,缓慢地讲述,生怕我听不清楚,需要他重复。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重复这些话的,万不得已,也不愿意说出这些事,我理解他,就像他理解我一样。

听着这一个一个故事,我感受到了一种静默的伤痛。我在静默一个个纯洁的灵魂。那些曾经鲜活得如同雪莲花一般的生命,匆匆而来,稍纵即逝。那些灵魂就在我身边,甚至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静默,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最好的超度。

深山藏虎溪

绵绵秋雨在通往帽儿山的公路上扬了一路墨迹。我们沿着黑黑的墨迹接近虎溪窑。不过,秋雨还在空中洒了一层雾气,让前途和目标变得神秘莫测。

道路两旁的草木沁出秋天的气息。雨点打在草木上面,那些气息便滴滴答答迸溅起来,把整个旅途熏染得无比绚烂。

一座又一座村落迎面扑来,随即向后闪去。整个大地缓缓转动,另一个世界徐徐打开。一个世界打开的过程很像剥笋,真相末尾总是最后出现。

我要去拜访的王丹,久闻大名却未曾谋面。他用方寸泥坯刻画出来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还未可知。可是,它的神秘大门正徐徐打开。

后来,一道山影闪出来。朋友说,那就是帽儿山了。

帽儿山,便是虎溪窑的所在。

书法家王丹与画家王丹早已闻名。“陶印王丹”的诞生却是留学日本时的一个偶然。在一个陶艺工作室王丹做成平生第一方陶印,印文是“一字值千金”。那块松软的泥土变成风骨印章,令王丹惊异。此后他便痴迷陶印。

1994年,王丹从日本回来,决定从事陶瓷印的创作。他走了很远的路去寻找能够烧制陶瓷印的窑地,结果都失望而归。可是王丹相信,有一个地方等着他,其实它就在锦州西北的帽儿山。1997年,经朋友指引,王丹在帽儿山下的老虎沟开始修建虎溪窑。一砖一瓦地铺衍